

六

妇孺血泪

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
www.krzzjn.com

我的苦难童年

鞠永发 口述

王者安 李宝安 整理

我1930年出生在山东省临朐县五井鞠家庄。全家共有7口人，我爹和哥哥常年在外出当长工。由于生活难熬，我娘领着我

和弟弟出去要饭维持活命。

1941年，我们老家发生了严重的旱灾，在我们庄上有一口9米多深的大井也都旱干了。有不少人被大旱夺去了生命。再加上这一年，日本鬼子侵占了这一带，三天两头来庄上进行扫荡，粮食被他们抢光了，青壮劳力被抓走了。我姥爷眼见我们饿得不行了，拖着病身子爬到树上去摘树叶，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，再也没有起来。姥爷死后，姥姥没多久又病又饿死在了大道上。

天灾，人祸，使我们这些穷苦人无法生活下去。为了生存，18岁的哥哥被逼着闯了关东，来到通化煤矿下井。一年之后，就死在了井下。

为了寻一条生路，我爹在我11岁那年，就领着我出去做零工混饭吃。开始在附近，白吃白干还有人用，后来时间一长，就没有人用了。我们爷俩走出一百多里地也找不到活干，一天，我悲伤地拉着爹爹的手说：“爹！咱们别走了，走出这么远，也没活干，娘在家不知多惦念咱们，咱们回家吧。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我爹的心像刀绞一样难过，他仔细看着我，从头到下摸着我这又瘦又小的身子，伤心地大声哭了起来。

有一天，我们爷俩来到了益都县城，在街里走了半天，也没找到活干。没办法，爹爹只好带我准备往家走。当我们来到火车站时，迎面走来一个戴眼镜的家伙，前前后后看着我们，说：“你们是哪的人，想找活干吗？”一听这人说有活干，我爹高兴地说：“是呀！先生，我们就是为找活干，挣碗饭吃出来的。”那人一听，就把我们领到不远的一个屋子里。

进屋一看，里边坐着两个人，一张桌上摆着一大盆白面饼。那人指着饼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愿意去做工，就到东北去，那的活不累，成天都吃这个，愿意去到那捺个押。”说着用手向里指了一下。里边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，皮笑肉不笑地向我爹递过来一张白纸，问了我爹的姓名后，就让在上面捺了手印。然后，他又表现出十分关心的样子，摸摸我的头，说道：“你看这孩子瘦成什么样子，跟你爹到东北后就好了，有吃有喝，到那以后就再也不想回来。去吧，去了好好干。”

这时，另一个人走上来，把我们领到一个大屋子里，再也不让出去了。

几天功夫，又陆陆续续地进来好多人，直到第3天，大概人差不多了，就把我们送上了闷罐车。

二

上了车后，大伙谁也不知道拉到哪儿去。有的人就私下议论说：“唉！这下算完了，说不上拉去干什么呢？”“说不定就是把咱们当劳工卖了。”火车走了一天，来到济南，停车后，车门打开了，让我们下车放放风。这时，又有好多人，老的小的，全家的也有，统统都被赶上火车。就这样，前后走了五六天，来到了西安县（今辽源市）。

下了火车天已大黑，我们由谭家大柜来的汽车拉到矿山。我

和父亲被分到大成矿二坑。住的是独身大房子，一条长炕，炕两头住着炕长。来的人一个挤一个住在中间，每人枕一个砖头或木头头，盖的是麻袋片或草袋子。我一看这情景，就痛苦地哭了。一是出来找活，越找越远，来到这里哪像人住的地方；二是心里想我娘，这一出来，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老人家。

开饭了，大家伙一看，全都楞眼了，这哪是什么白面饼啊！而是通红带壳的高粱米饭掺苞米粒子，砂子多得合不上牙，里边耗子粪也很多。这时，大家心里都明白了，我们上当受骗了。可是，已经晚了，进来就别想走出去。

第二天，我父亲就被挂上号，下井干活去。每天早上6点多钟，就被炕长赶下地，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来，一天干活回来，累得他躺在炕上一句话都懒得说，成天愁眉苦脸的。因为我是一个小孩，没有让挂号上班干活，成天就呆在屋里。

父亲由于干活劳累，加上心里懊丧，一股火就病倒了。躺在炕上起不来。一天，一个叫赵德春的小把头，拿着榔头来到父亲跟前，硬逼他起来下井干活去。父亲央求着说：“我实在起不来呀，就是起来也干不动活，求你让我再歇几天吧。”不论父亲怎么说，赵把头就是不答应。父亲一看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咬着牙，硬支起身子，下井去了。

一个病人，体力弱，怎能干动笨重的活。一天，父亲刚下井不久，不小心左脚就被一块大岩石砸伤了。升井后，我扶他来到坑口诊疗所让大夫看一下，结果大夫根本不给好好看。不几天，就化脓烂得直流血水和脓。这下子父亲就一点动弹不了，躺在炕上疼得直叫，看到他那痛苦劲，我心里更加上火。父亲躺了一段时间后，炕长和把头不让了，不容分说把我们赶出去，不让在大房子里住。我们上哪去呀！可怜的穷人。看到父亲病成这样，我想哭也不敢哭出声来，怕父亲更上火。当我们走到

大柜的门口时，站岗的外勤一看，以为我们要逃跑，就连推带打地把我们赶了回来。最后，把我们安排在大柜的“病号房”里。

这“病号房”实在令人害怕，满屋子都是人，哭的哭，叫的叫。这时候，已是秋后了，晚上很冷，屋里一点热乎气也没有。我扶着爹爹好歹找了一个地方，把他安顿下来歇会儿。

天黑后，我觉得饿了，就对父亲说：“我出去找点吃的去，你好睡一觉。”父亲拉着我的手，半天说一句：“孩子，不用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出去呀，不然被把头抓住就是一顿打。”说完就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我看他病成这个样子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这时父亲从昏迷中醒过来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爹不行了，爹对不起你，把你带到这么远……”停了一会儿又说：“你娘在家……还不知怎么样，你以后一定想办法回去看看她。你可要记住爹是怎么死的呀！”说完就又昏过去了。我趴在他身旁，大声地哭起来，也不知哭了多长时间，哭着哭着也就睡了。

忽然，一声喊叫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不知怎么回事，有人告诉我：“你爹没气了。”啊！我一翻身就拉着他的手，哭叫着：“爹！爹！！”我拼命地摇晃他的手，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拉起来。直到我把眼泪哭干了，爹爹也没有醒过来。

第二天，大柜就用专门拉死人的小车，把父亲用破席子一卷，一头还露着直滴滴脓血脚，拉到“仙人洞”山上埋了。从坟地回来后，看着爹爹躺过的地方，心里像撕碎了一样，眼泪又像泉水似地流了下来。我一个12岁的孩子，远离家乡，唯一的一个亲人又死了，以后还怎么活下去。一无亲二无故，怎么办？我站也不是，坐也不稳，屋里屋外，进进出出的，心里想家都要想疯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天天哭。几位同屋的大叔，劝着我说：“孩子

别哭了，再哭就哭坏了，等几个月我们挣了钱，就送你回山东老家去。”听了这些话后，我心里也踏实了一些。

三

没过几天，赵把头又来了。他满脸堆笑地对我说：“大柜上看你很可怜，在这吃住也不行啊。你知道谭家柜是没有吃闲饭的，你就跟王把头去吧！”他一看我不吱声，就接着说：“王把头是谭把头的妹夫，他家有吃有喝，决不能亏待你。”

后来，我把这事和一位段大叔讲了，段大叔说：“狼肚子掏不出好‘下水’来！你要小心点。”

第二天，赵把头拉着我要领我走，我说：“我不去啦，还是给我挂个号，让我下井干活吧！”没等我说完，赵把头就翻了脸，瞪起三角眼，大声的骂道：“别他妈的不识抬举，你知道不知道谭家柜都是不好惹的。你爹有病多长时间没上班，吃的饭钱，来东北的路费钱，死了的棺材钱……，加在一起你一辈子也还不清。你不去，就给我拿钱来。”没有办法，我只好跟人家走了。

到了王家后，给我改了姓名，叫王诚随，小名叫小随子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每天拿着小麻袋出去拣煤。拣了煤就卖几个钱交给王家。

成天在矸石堆里拣煤，也拣不到多少，更拣不着好的。没办法，我就去场大堆去偷，经常由于偷煤遭到看煤的日本人毒打，打完了把人一放，麻袋就给烧了。为了能挣几个钱，明知挨打还得去偷。

15岁那年，我就挂号下井干活去了。起初在井下推车，我人还没有车高，根本推不动，只好和别人合伙推一个，把头嫌我没有用，动不动就用镐把打一顿。

后来，把我分到保安干活，领头的叫范世文，见我是一个

小孩，很同情我，让我和大伙在一起给煤洒水，砌密闭和设风筒。这活虽然轻一些，但也有危险，特别是到煤尘大的地方去洒水，要爬到掌子上去。掌子刚放完炮，煤一个劲地往下掉，一不小心就被砸一下。

有一次，我和工人正在井下干活，突然十四路发生了瓦斯爆炸，连响几次。我和几个工人吓得从排风道一步一挪地钻了出来，才算逃条活命。我们出来一看，鬼子和把头正逼着消火木工在井口密闭巷道，他们根本不去抢救工人。过了几天，打开密闭一看，我们发现有好多人都已经爬到跟前了，有的撞坏了头，有的挠破了手指。40多个工人横七竖八地躺地巷道里。看到这情景，好多工人都哭了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我们这些“煤黑子”终于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榨。欢庆胜利这一天，我激动得又流下了泪，想起我父亲为了活命被骗到东北，结果死得那么惨。可我的母亲至今还不知怎么样呢？

后来，在我一个表哥的帮助下，终于找到了我的母亲和弟弟，从此，我和亲人又团聚了。

（摘自《辽源文史资料》）

逮 捕

——绑架妻子，诱捕丈夫

（日）松原俊三郎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，打破门进去。”当我站在外面大门前这么想着的时候，刑事警察们也跑来了，踢破了门就闯了进去。我赶紧把脊背紧贴在隔开房间的墙壁上，用手枪对着里屋的门，一

面十分注意地警惕着四周。三名刑警把身体伏在火炕的烧火口 and 炉灶旁边，其他两名刑警用水缸当掩体，各自拿着毛瑟1号手枪，朝同一个门的方向屏住气息。从踢破的大门外面，零下40度的空气像白云似的团团飘了进来。

我用眼神向刘万全刑警示意。他向里屋高声喊道：“我们是警察呀，还不明白吗？快开门！”还是没有什么回答。“要是磨磨蹭蹭的可要开枪啦……日本人也来啦！”说着，迅速地砰砰两声，手枪开火了。随着两声枪响，柜橱的碗被打得粉碎，屋内婴儿的哭喊声突然响了起来。“要是反抗就要向里边开枪啦……举起手来，一个人一个人地出来，饶你们的命，里边有几个人？快说！”

“谁也没有，只有我和孩子。”里屋传来了青年妇女充满怒气的尖锐声音。刑警们的眼睛一齐注视着我。

“好，是女人。进去！”刘万全和高鹏举扑向房门，门怎么也打不开。发急的崔鹏程从南墙边迅速操起了锄头，照着门咚咚敲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锄头被敲断了，门也被打破了，6个人拥进屋内。背靠着墙紧紧抱着婴儿的25岁左右的妇女，对白天意外闯入的人非常生气，一只手拿着剪刀，做好了谁走近前就扎谁一剪子的准备。

“别动！”六只手枪一齐瞄准妇女。一瞬间，妇女稍稍弯下腰来，把婴儿保护在怀里，苍白的脸气得发抖，闪电般的眼光盯住我，像要阻挡我似的。“妈的，反抗吗？”我跳上了火炕，用防寒长靴踢倒了妇女。

“怎么？就一个女人吗？”我放下心，环视一下屋内。在倒下的妇女旁边，乱放着正扎的草鞋底和做鞋底的碎布。在屋里土地的角落里，有一只高宽各50厘米、长1米左右的衣箱，上面有一个茶碗和叠着的两三床破被褥，墙上吊着四五颗苞米，此

外什么也没有了。这是一个空荡荡的边长4米左右的四方形小屋。

“喂，女人，你是张春生的老婆吧……你丈夫是个大马贼，是八路的狗，我们掌握了确凿的情报。你丈夫上哪儿去啦？快说！”

“我，不知道。”妇女像是发泄怒气似的说道。她猛地转过身去，背向着我。

“混蛋，瞧不起人呀……喂……我可是一个够年头的日本警察，而且是肋七等功七级的柔道老师，能让你这个笨蛋老百姓的老婆看不起吗？等一会儿你可别哭着求我……喂，大家搜查！”我走向衣箱，崔鹏程用刚才打折了的锄柄咚咚敲着墙壁和屋子的土地，开始搜索了。马德祥卷起火炕上的破草席。我把衣箱上的茶碗和被褥扔在了泥地上，然后打开箱盖一看，里面装着旧衣服和破烂。上面有一个小筐，装着三个鸡蛋。我一扔到地上，鸡蛋就破了。妇女一看见，就从炕上跳到地下，喊道：

“啊，你干什么？这些鸡蛋是因为我生病，奶不够，给孩子吃的。”说着，想要拾起筐子。

“什么，这样的东西，哼！”我用防寒长靴把鸡蛋踩得粉碎。

“啊，啊，现在鸡不生蛋了。”她一边喊着一边拼命地紧抓住我的脚。

“唉，讨厌的娘们！”咚的一声，我的防寒长靴朝着妇女胸部踢去。

“呜呜，呜呜！”妇女惨叫着倒了下去，但是又痛苦地挣扎着站了起来。她那燃着怒火的眼睛死盯着我，咬紧牙关看着我不断从衣箱里扔出来的穿的衣服和布头。我拍了拍手上的土。史岳山和高鹏举两人各自从外面推来一辆全新的自行车进入屋里。

“没有找到人，但是在外边放东西的小屋里有两辆自行车。”他们说。

“这是好的自行车，最近不大容易到手，现在都是代用品。”我靠近他们前面悄悄说道，“把这个拿回去……好吗？我那辆旧的给你们处理吧……懂吗？”两个人对望着，狡猾地微微咧开嘴笑了。

“我丈夫给附近的农民修理自行车，靠这来维持生活。这辆自行车是邻居托咐修理的，是重要人物的东西，还给我！”我的耳里突然听到这愤怒得发抖的尖锐声音。

“讨厌，警察不听你的指挥。唉，找麻烦的娘们，戴上手铐！”史岳山猛扑过去，想要给她戴上手铐。妇女突然翻过身来，躲到火炕上。刘万全追了上去，把她胳膊拧起来，戴上了手铐。

“放开！”妇女想咬开手上的手铐。正在这时，停止哭泣的婴儿突然又大声哭喊起来。“啊，儿子！”……妇女伸出戴上手铐的双手，把孩子小心地抱了起来，蹭着脸，流着几行眼泪，咬着嘴唇。

“空手回去，科长没有面子，要是你丈夫不在，你替他去吧。”我说。

目不转睛盯着手铐的妇女，向我转过身来，规规矩矩地端正姿势跪倒在地，磕着头道：“大人，我现在有病，要是找我丈夫张春生有事，等我丈夫回来，一定带他到齐齐哈尔去，请把手铐给我打开吧，孩子也要死了。”她多次在地上磕头，合起手来作揖。

“哈哈……不行。哭求的手法已经是老一套了。”我那冰冷的声音在屋内整个空间回响着。从外面刮进一阵寒风，吹动着妇女蓬乱的头发。

“啊，误了火车可不得了，快押走吧。”

妇女站起来反抗。刑警们连拉带扯勉强把她拉到已在外面等着的爬犁上，戴上了脚镣。妇女刚想解开脚镣，手就紧紧地冻上了。手上的皮脱掉，血流了出来，冻在爬犁上。崔鹏程从屋里提出婴儿，扔到妇女手里。妇女没有办法，只好用破烂的被子把婴儿包上，再用一条被子包住自己的身体。可怜的婴儿哭声，遇到寒气，好像是在我耳边抗议似的响着。我对那个拉来带路的北安省^①依安县长阳镇村村长说道：“张春生要是回来了，你负责带到齐齐哈尔。那就把他的老婆、孩子还给他。从今天起10天之内，等到1942年2月10日。如果他逃跑了，你与家属同罪。明白吗？”我留下话后就奔泰安镇火车站，乘着爬犁飞奔了4个小时。在零下40度的北风狂吼中，三匹马在北满的旷野上奔驰，马蹄好像卷起了暴风雪，雪片不断。我感到脸上像针刺一样痛，不由得把脸深深地埋在毛皮外套里看那妇女。妇女的头发被雪冻得粉白，脸色通红，然后变成了紫色。但是，妇女把婴儿紧贴在自己的肌肉上，婴儿哭了，就敞开胸怀让他吃奶，同时咬着嘴唇死盯着我。

从泰安镇乘火车，4小时后到达齐齐哈尔，已经过了半夜12点。母子被扔进了看守所，咔嚓，重重的铁门关上了。

此后过了10天，傍晚——

“长阳镇村长抓住张春生后到这里来了。”刘万全闪着奇怪的眼光，盯着我的脸说道。

“哼，那是预料得到的。这就是‘立即见效’的道理……立刻拷问，叫他交代背后关系和同犯。要是招了，就逐个抓来。”

这样，接连三天用水刑、吊打、过电等刑法拷问，张春生一句也不交代。

^① 日本占领我国东北，伪“满洲国”成立后，日伪为了便于统治，将东北三省划分为若干小的行政省区，北安省即为其中之一，位于黑龙江省内。

“好，要是这样，就用最后手段啦。把张春生带出来！”

“快走吧！”走廊里响着马德祥刑警的声音。随着哗啦哗啦的脚镣声，刑事室的门刷地敞开，裸着上半身的张春生进来了，宽阔的肩膀，圆粗木棒似的胳膊，到处交错重叠着紫色肿胀的鞭痕和棒迹。他双颊带着疙瘩刺儿，嘴唇厚厚的，不屈的眼光火辣辣地瞪着我。

“这个混蛋是反日分子，打他！”我挥起了挂在旁边墙上的像棒球球棒似的大棒子，啪啪接连不断地把他打翻在地。“呜呜！”他发出惨叫。我对弯曲着身体向前摔倒在地板上的张春生，仍然不断地狠打着：“混蛋，稍微尝到厉害了吧？好好记住我的脸。这就是对人小看的结果。好，现在开始上主要的一道菜啦，吊起来！”

刑警们簇拥而上，把张春生的两手绑在膝盖下面，从腋下穿过铁棒，在垫上两张桌子架起来的台子中央吊了起来。张春生胳膊要掉下来似的痛得扭歪着脸，咬紧牙关，挣扎着反抗。10分钟……20分钟，最后，力气用尽了。在精疲力竭地耷拉下来的额头上，大粒的汗珠渗了出来，顺着脸颊从下颏滴到地板上，地板完全像冲过水似的濡湿着。

“哈哈……正是好时候……叫他老婆和他见面。哈哈……”我向刘万全招手，和他耳语说：“快一点叫他老婆承认是同犯。这个家伙由于想家，也一定会说出秘密来。”刘万全点了点头就走了。不久，轻轻的脚步声音在门前停了下来。妇女一步踏进房内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吓了一跳，站住了。

“啊，春生！”她叫了起来。她在发出绞肠似的惨叫的同时，像发疯一样正要跑到丈夫跟前，刷地脸色变得苍白，全身痉挛，前后左右大大晃动，“呜呜！”手往空中一抓，突然倒在地板上。“啊，畜生！”张春生喊了一声，猛然睁大眼睛，使尽全身力气

进行反抗，把桌子摇得咯吱咯吱地响着。他用尽所有力量喊道：“把女人们也这么糟蹋，你们还是人吗？”他气得拼命摇动着吊他的台子，但是脸色逐渐变得难看，终于不动了，咯噔一声把头垂到了前面。

“哼，没有志气的家伙，夫妇一起挺着不动了。扔到看守所去，泼上水！”我留下话后，为了报告情况而去了科长室。在司法科长住永警佐的胖脸上，本来就小的眼睛眯得更加细小了。他用冷酷的声音说道：“北安省依安县受到抗日联军王明贵部队相当大的影响，那一带的‘治安’非常不好，全部是‘一色贼地带^①’。张春生至今顽抗，坚不招供，也可以说明是受到这种影响。所以，不管有无证据，是否百姓，都没关系。文件上即使没有他的招供也不要紧，只要把他直到今天还进行的这种反抗记录下来，处以死刑就有充分根据，准备解送案件。那个女人病得这样，也许不能维持几天了。如果死在看守所，那太麻烦，趁现在这样赶她出去才是好办法……就这么办吧。”这声音碰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到处回响。

“拉出去算了。”刘万全拉住妇女的手，高鹏举和崔鹏程从后面推着，硬拉到警察局的大门外面，咔嚓一声把大门关上了。妇女发疯似的敲着大门喊道：

“还我丈夫！”

“我一分钱也没有！”

“我和孩子都在生病！”

随着北风可以听到妇女的哭叫声混杂着婴儿无力的哭泣声。这声音逐渐微弱下来，终于听不到了。北满冰冻的夜深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在警察局旁边的中央菜市场大门前面，风刮

^① 指抗日联军支配的地区——原注。

成的雪堆里发现被埋了一半的母子冻死的尸体。母亲一只手紧抱着婴儿，一只手像要抓什么似的。不知是谁赠给他们的送别物品——在棍头上放的两个馒头，引起行人们的注意。

本文作者简历

原籍：岩手县盛冈市

出身阶级：中农

学历：普通高等小学校二年级毕业

职业：铁路工人

所属部队：旧“满洲国”齐齐哈尔市警察局刑事科。被捕
时间地点：1945年10月7日，旧“满洲国”齐齐哈尔市。年龄：
47岁。

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8月）

最近，在中东和各地，以美国为中心，的确又存在着火药
气味。比广岛和长崎扔下的原子弹有700倍杀伤力量的氢弹，用
上一两个，将使日本全部消灭。那么，最终世界上的人类又将
会怎样呢？

我在23岁那年，作为日本现役士兵被拉去侵略满洲，又在
支那事变^①中干过两年。我在日本是警察官，又在“满洲国”担
任警察官，日夜只想拼命为国家、为国民而工作。现在才明白
是受了一部分军阀和财阀的欺骗，感到无限遗憾。我已经73岁
了。我的余生不管还有几年或几个月，我下定决心，必须亲自
把战争的罪恶告诉那些不知道战争的人。在严寒的西伯利亚，我
曾经体验过比死还辛苦的劳动和饿肚子。日本战败后，国内也

① 这里指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——译者

因受过轰炸而很多国民被烧得无家可归，带着伤，无衣无食流浪在街头。我衷心祈求：不能再让世界上，不能再让我们的儿子和孙子辈们，经历这种痛苦的时代了。

（松原俊三郎）

（摘自《三光——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》）

日本侵略者害得我家破人亡

张福才

旧社会，我们劳动人民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。我要过饭，当过童工，一家6口人死的死，离的高。地主逼债使我们生离死别；日本侵略者、汉奸、把头又害得我家破人亡。

背井离乡到炭矿

我的老家在河北省蓟县塌庄子。爷爷给地主扛了一辈子大活，到死时反欠下地主一笔还不清的阎王债。为还债，爹、娘及哥嫂又拼死拼活地给地主当了几年长工，结果还是没还上那笔驴打滚的阎王债。后来，地主逼债，又抢走了我的只有3岁的小弟弟。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的家乡后，实行了惨无人道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又大搞“集家并村”。这样，我一家人在塌庄子实在呆不下去了，为了寻条活路，我爹娘只好带着全家外出逃荒。

1941年冬，正当爹娘拖儿带女，要饭逃荒，忍饥受冻，痛苦挣扎的时候，却遇上了一个北票到我乡招工的把头。他对我爹说：“你们现在逃荒没有出路，不如跟我下关东挖煤去。那儿

住大楼，吃白米饭，穿洋服，一个月一开支，半个月一借款，保你全家能过上好日子。”爹一听到这个消息心就活了。晚上，爹和娘商量说：“孩子娘，听这个人说北票那么好，我们去吧！何必在这儿东奔西走地等死呢。”开始，娘还惦记着被地主抢走的小弟弟。可后来，娘看了看我和哥嫂个个面黄肌瘦，都是三根筋挑着一个脑袋时，就叹了口气，狠了狠心说：“去吧，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了，到那儿或许能过上好日子，总比守在这儿等着饿死强呀！”第二天，我们全家同一块招来的100多穷苦农民，被装进了闷罐车，闷罐车里臭气熏天，又闷又冷。我们坐了两天一宿的车，来到了北票炭矿。

一下车，“迎接”我们的是满天的乌鸦，荒凉的山岗，挎着洋刀的日本侵略者和提着木棒的警察。我们这些人都会被赶进了四周围满铁丝网、电网的低矮的劳工房里。这些劳工房又潮又湿，臭虫蚊子爬满墙。眼看到这一切，爹娘当时心就凉了半截，知道上当了。可是，别无它路可走，只好凭天由命吧。就这样，我一家逃出了地主压迫的火坑，又落入了日本侵略者、汉奸的虎口。

爹夜命死不瞑目

爹在老家时曾干过瓦匠活，有点技术，日本侵略者和把头就把他分到瓦工班当领头人。说是领头的，实际上等于给他套上了夹板，让你给他们多多卖力气。领大伙干活，别人干不好都找他一个人算帐。爹是个刚强汉子，只知道干活，所以也拼命地带领大伙干。一年下来，满以为能多开点工钱过个好年。可是，结果连1元钱也没发给他。爹去找日本人和把头说理，问把头：“我们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年多，为啥不给开工钱？”把头一听，那长满嘟噜肉的脸就像针扎了似地抽动一下说：“为啥？你

全家从关里是怎么来的？啊？一路上你们脚踩着我的，屁股坐着我的，如今还吃着我的，住着我的，这些，你一年的工钱还不够扣呢！”爹说：“招工你们不是说盘缠费由矿上拿吗？”“矿上？哼！想得倒便宜！”爹气得浑身打颤说：“你们……不讲一点理呀？”“理？老子就是理！你他妈的再来搅闹，就打死你！”这时，日本侵略者也在旁帮腔：“滚！快快地滚！”爹当时气得差点昏过去，哆哆嗦嗦地回到家，一头就倒在炕上。娘见他脸色苍白，问他出了什么事，他流着眼泪说：“别提了！实指望到北票能过上好日子，可谁想到整整累了一年多，到头来一个大钱都没给，往后咱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”说完就昏了过去。爹那早已被沉重的苦役累得多病的身体，又加上这飞来的横祸，气恨交加，他实在支持不住了，终于病倒了。病中，爹烧得糊里糊涂，喃喃地说：“我想吃……吃个梨。”娘见爹这样子，急得直哭。家中连一碗饭都没有了，哪有钱买梨呀。因无钱给爹看病，只好眼巴巴的看着爹被病魔折磨着。爹临死时拉着我和哥哥的手说：“孩子啊，你们可一定要记住……坑害咱的是日本侵略者，是把头呀！是他们逼死了你爹。把头坑咱工人的钱，都拿去巴结日本人了。你们可不能饶这些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把头呀！”说完，爹就咽气了。他怀着满腔的怒火、无限的仇恨，离开了这个给了他40多年苦难的世界。

爹这一死，真好像房子断了梁，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。娘带着哥嫂和我四处求人，借钱给爹买棺材。可是，那时的矿工个个都是吃上顿没下顿，谁能有钱外借呢？没有别的办法，便在穷哥们儿的帮助下，娘给爹缝了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，将就着把爹埋上了。可是，不到3天，那件衣服也被人扒走了。可怜的爹拼死拼活地干了一辈子，到头来连件遮体的破衣服都没穿上。

被迫下井当童工

爹一死，我家的日子就更加凄惨了。没吃没烧，经常揭不开锅。生活的重担全落在只有二十几岁的哥哥身上了。哥哥在机厂当翻砂工，每天十二三个小时的劳动，累得他直不起腰来。哥哥身体本来就on不好，又加上在老家时曾被日本侵略者搞“集家并村”时打伤过，至今一直没得恢复。所以，哥哥每天都是强挺着去干活，晚上回来就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，有时一吐就是一盆。爹刚死，也没钱给哥哥抓药吃。可怜的哥哥，在我爹死后第7天晚上就活活累死了。

爹和哥哥这一死，家中没有人在矿上干活的了，炭矿的日本侵略者、汉奸把头就来撵我们搬家。他们大吵大骂：“人都死了，没有干活的了，还住什么工房，赶快搬走，马上滚蛋！”娘和嫂子苦苦地哀求，邻居们也都帮助说情，并答应把我送到井下去做童工，这才没有被撵出工房。那年，我虚岁才只有15岁。

我被分到冠山一坑下井推炭车。天还不亮，催班的就来我家催班。他们个个如狼似虎，每次到家非打即骂，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去上班。到井下干活，由把头和日本监工管着，稍有不慎就会挨木棍和铁榔头。记得我第一天上班，一到井下，就直发懵，电车来了我站着没注意，就被把头踹了两脚。那时我虽说已15岁了，由于长这么大从没吃过一顿饱饭，所以个子矮，还骨瘦如柴。一吨多重的大炭车，比我的个子还高，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也推不了几步，有时遇到上坡路就更难推了。工头把头见我推不动，就用木棒敲我的脑袋，打得我昏头昏脑，把头还骂我是磨洋工、泡蘑菇。在一旁的日本人监工也挥动鞭子和小铁榔头“呜哩哇啦”地乱叫一气，逼着我拚命地给他们推车。每天到升井时，累得我精疲力尽了，走路都抬不起腿来。回到

家往炕上一倒，饭也吃不下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滚。娘用手摸着浑身伤痕，也跟着我一起落泪。第二天，不得已还得硬撑着去上班。因为不上班就没有饭吃；不上班，就没有房住。

当时在矿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：“人间地狱十八层，十八层底下是矿区。”我们童工的处境就更加悲惨了！

日本侵略者为了开心，还经常拿我们小童工当玩物。记得日本人经常把我们几个小童工叫到凉水池子旁，叫我们互相用凉水管子往身上浇，浇得浑身打哆嗦，上下牙直打架，日本人在一旁哈哈大笑，笑够了才算了事。有时，日本人稍不顺心，就用他们那一头尖尖的小铁榔头敲打我们；这样还觉得不解劲儿，就要我们跪石头子；他们高兴的时候，把我们叫去弹一顿脑壳。总之，我们童工就是日本侵略者兽性发作的最好工具。

在井下，我们童工多是干推炭车、看风门、攉煤、挖水沟等活，工作量是十分沉重的，工作时间是12小时以上，几乎和成年人干一样的活。可是，每天实际工资只给一角钱，刚好是成年劳工的一半。就这样，日本侵略者还说是便宜了我们这些小窑花子。

由于战争的需要，日本侵略者采取“人肉开采，以人换煤”的政策，疯狂地掠夺北票的优质煤炭。为了能产更多的煤，日本侵略者根本不在井下搞什么设施，因而瓦斯爆炸、塌方事故时有发生，这给矿工和家属带来巨大的灾难。记得1942年秋，冠山一坑二号井发生一次瓦斯爆炸事故，当时就死了矿工50余人，伤10余人。矿工和家属们聚集在井口，悲痛欲绝。日本侵略者却一边用鞭子驱赶着矿工和家属们，一边叫喊：“哭什么，中国人多得很，死了死了的没关系！”

日本帝国主义口头上喊什么：“仁义道德”、“日满亲善”、

“共存共荣”，这是骗人的鬼话，实际上实行的却是残酷的法西斯统治。比如：当时井下漏水非常严重，淋头水成河，空气稀薄，煤尘呛人，潮湿闷热，没有一点安全设施。我们多次向日本人、把头提出应维修，他们根本不予理睬。日本侵略者推行的“人肉开采”政策的中心是：采用“前进扒两帮、一捅冒落光”的办法，用人肉换煤。所以，我们的双脚一年四季都浸泡在污水之中。冷天冻得发紫，变肿，最后变成冻疮；夏天被蚊虫咬，发炎后溃烂。我们矿工的衣服多为披麻袋片、水泥袋等，个个都是衣不遮体。就是这样的“衣服”，常年也都是湿的。夏天好歹还能对付着过，一到冬天就难了，到升井后冷风一吹，湿衣服就变成硬梆梆的。所以，矿工们每天升井后就不得不快跑着回家。当时曾有这样一句民谣来形容这一情景：“腊月窑花赛如马。”

母亲含恨离人间

爹和哥哥的惨死，又加上我们生活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的，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，终于使娘病得起不来炕了。当时我和嫂子急坏了，我们可不能再没有娘了！于是，就靠东借西借地凑点钱，把娘抬到医院。那时的医院是日本人开的，我们穷人想看病就得花高价，凑那点钱哪里够给娘看病的，好话说了千千万，汉奸医生总算把娘收下了。娘的病越来越重了，趁我们给娘弄吃的时候，日本人医生就把还没死的娘抬到太平房去了。我和嫂子赶回医院，跑到太平房一看，见娘和一堆死人躺在一起，这时娘的呼吸已经很困难了，我和嫂子连声哭喊娘，娘睁开了无光的双眼，看了看我们，泪就流了下来。她伸出了那双干枯无力的手，拉住了我和嫂子，悲愤地说：“孩子，娘和你爹领着你们从关里老家到北票炭矿，心想闯条活路，没料到一家6口

人，眼下就要剩下你们叔嫂俩了。娘也快不行了。”娘喘息了一会，用微弱的声音又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要记住，……你爹、你哥哥和我都是被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把头逼死的……你们可一定……一定要报仇呀！”说完，她紧闭双眼大口地喘息着，我和嫂子又哭喊着。过了一会，娘又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最不放心的……就是福才，福才你……可别离开你嫂子呀！她就是你的亲……亲姐姐……”娘说到这儿，又一把抓住嫂子的手，眼泪不住往下淌，吃力地说：“媳妇，娘待你……不薄，福才他……他还是个孩子，你好歹也要把他拉扯成人，可千万……千万不要把他扔下哇！……”说着娘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，那拉着我们的手垂落下来，她带着深仇大恨死了。

娘死后，嫂子就四处做零工。就这样，嫂子始终也没有离开过我，我们叔嫂二人相依为命，终于渡过了那苦难的岁月。

1947年，北票解放了，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们矿工救出了苦海，由过去的奴隶变成了新中国的主人。我于195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如今，我已光荣退休了，在家享受天伦之乐。我经常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、我全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害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讲给子孙们听，告诉他们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这段历史，要牢记这民族的耻辱，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，把祖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！

（战丽珠整理，摘自《朝阳文史资料》第二辑）

日本侵略者骗得我全家受难

陈德海

我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日照县河上屯人。1941年，日寇在这个地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，我们一家人逃荒被骗来到北票当了矿工。

盼望到北票一家老小能有碗饭吃，谁知道逃出火炕，又进了活地狱。我的父亲陈树龙被逼到台吉一坑采煤。被地主残害得骨瘦如柴的父亲，怎能顶住坑下每天干十四五个小时的活儿。有一天，一个日本侵略者叫他扛一根200来斤重的木料，累得他满头大汗，走几步就摔倒了。工友们发现后，把他送到家。父亲昏迷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才苏醒过来。这时两个催班的狗腿子拿着榔头、木棒闯进屋来，冲着躺在炕上的父亲大声吼叫：“还享什么清福！赶快给我下坑去！”我母亲说：“孩他爹昨天在井下摔坏了，今天不能上班了。”两个狗东西又大声嚷叫：“脑袋硬不硬？硬就得上班！”举起榔头就向父亲打来，母亲赶忙用自己的胳膊挡住。这时邻居秦大叔正下班回来，见此情愤愤不平地说：“老陈确实摔得厉害，他不能下井。实在要去，我替他去！”经秦大叔这么一说，两个狗东西才骂不绝声地滚开了。我父亲一病不起，不上班就得不到饭票，一家人就吃不上饭了。在那隆冬腊月，母亲只好带我去拣煤。那时候拣煤要花钱起票，我没钱就偷偷地溜进煤场去。有一次，被日本侵略者发现了，他像吃人的恶狼，上去一连打了我好几个嘴巴，打得我口吐鲜血。而后，他又把我摔倒，将我的拣煤筐踩个粉碎。我哭着回家对

母亲说：“日本鬼子太坏了，我长大一定要报仇！……”母亲给我擦去嘴角的血，含着泪说：“孩子，别哭了，这个世道是不叫咱穷人活呀！你爹病得那样，你再有个好歹可咋办？”这时，不懂事的小弟弟饿得又哭又叫：“娘啊！我要吃饭！我要吃饭！”父亲再也躺不住了，说：“我不能眼看着孩子们饿死，我下坑去！”父亲拖着沉重的病身子下坑了。有一次，工人们正在干活，一个日本侵略者手拿着镐头走来，见一个工人没给他敬礼，他上去把这个工人踢倒就打。在一旁干活的父亲，简直肺都气炸了，上去一拳把这个日本人打个跟头，并指着他鼻子教训道：“你不能随便打人，照这样我们不上班了！”这个日本侵略者挣扎起来，疯狗似地向我父亲反扑。这时，父亲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，便与他扭打在一起，我父亲被日本人一镐头打在头上，鲜血顺着耳根流下来。掌子上的工友一拥而起，吓得日本人溜走了。经过工友们的帮助，闯过几道关口，才把我父亲送到了医院。父亲躺在医院里，饭吃不上，水喝不着，加上得不到治疗，病势越来越重。一天，我拣煤回来，去医院看望父亲。看到父亲又瘦又黄的面容，我“哇”的哭了起来。父亲无神的眼睛凝视我好久，才慢慢地说：“孩子，找你娘去！”我一阵风似地跑回家去叫妈妈。妈妈扔下生病的小弟弟和刚生下两个月的小妹妹，急急忙忙和我到医院，看到父亲直挺挺地躺着。这时，我上去吃力地扶着父亲，父亲才慢慢睁开两眼，望着我们，嘶哑地说：“海他娘，我死后你带着孩子，要饭也要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！”就在这时，父亲在井下打的那个日本侵略者带一群狗腿子闯进屋来，七手八脚的就拖我父亲。母亲和他们拚命去争夺。母亲瞪着愤怒的眼睛，向这群刽子手骂道：“我们人活着给你们当牛做马，人还没有死你们就下毒手，你们还有人性吗？”豺狼们更恼羞成怒，上来一个狗腿子，一脚就将母亲蹬倒，另一个狗腿

子把我连打带踢推在一旁，他们拖起我父亲就走。父亲挣扎着高喊：“海他娘，不要哭，要记住，要报仇！”我从地上爬起来，高喊着：“娘呀！爹呀！”叫娘娘不应，喊爹爹不语。我把昏倒的母亲扶起来，母亲睁开眼忙问：“海，你爹呢？”“我爹叫那帮坏蛋拖走了！”母亲傻了似的跑出去，到处寻找。找来找去，最后在死人仓库找到了父亲的遗体。母亲扑上去，痛哭不止。我拉起母亲，搀扶着她回到家。小弟弟问：“娘，我爹他啥时候回来呀？”“你爹他不能回来了！他，他被扔进了‘万人坑’了！”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。尽管北风呼啸，也压不住这血泪的控诉！大雪纷飞，也掩盖不了这深仇大恨！

父亲死后，抛下我们母子4人，无依无靠。为了孩子，母亲领着我披星戴月、顶风冒雪地拣煤、要饭。记得，有一年大年三十，刮着大北风，我母亲领着我好不容易地走到了一个村子，来到一家大门前，刚想去叫门，这时从院里出来一个肥胖的狗地主，一看我们是要饭的，就瞪起狗眼骂道：“穷气！大年三十登我们的门，冲了我们一年的吉利！快走开！”说完，便放出一条恶狗来咬我们，母亲上前护住我，这条恶狗向母亲扑去，把母亲扑倒在地，照大腿就是一口，咬得母亲的大腿鲜血直流。我赶紧扶起母亲，愤怒地盯着狗地主，拿起要饭棍子，向恶狗狠狠地打去。狗地主暴躁如雷说：“好啊！你敢打我的狗，你等着！”不一会，他就领来一帮地主武装——热北队，上前就把我母亲绑走，硬说她是“八路军探子”。把她押在一个大房子里，就用皮鞭抽，用枪把子打。打得母亲遍体是伤，几次昏了过去。半夜了，村里的几户穷人作保，狗地主才把我和母亲放了。

我扶着母亲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家。还没进门就听见弟弟、妹妹嘶哑的哭声。母亲进屋就急忙将弟弟、妹妹搂在怀里，摸着冻肿的小手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小妹妹用力地吃着母亲那干瘪

的奶头，小弟弟躺在母亲怀里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娘，我饿！我饿呀！”要饭筐空空的，哪有饽饽呀！母亲的泪簌簌地掉下来，说：“可怜的孩子，娘对不起你们，年三十还让你们饿着肚子。明天娘一定……”母亲再也说不下去，妹妹、弟弟也跟着哭起来。

这样的苦日子整整熬了6年。6年啊！仇恨堆如山，痛苦诉不完！直到1947年12月北票解放了，我们全家才过上幸福生活。

（王连玉整理，摘自《朝阳文史资料》第二辑）

日本侵略者逼得我丈夫典妻卖子

刘淑清

我们老家原在河北省遵化县万人丘村，我原来的丈夫叫张玉荣。我上有七十几岁的老公爹，下有1男3女，一家7口人，全靠我丈夫张玉荣给地主扛活挣的工钱糊口。可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家乡之后，开始实行“三光”政策，逼着老百姓“集家并村”，我家仅有的一间破草房也被日本侵略者一把火烧光了。从此，我一家7口人只好出外逃荒、讨饭。正当我们扶老拖小地逃到遵化县城的时候，碰上了北票炭矿的日本侵略者伙同倪家大柜来招劳工。我和我丈夫张玉荣听信了招工头子骗人的鬼话，就报名当了劳工。于1938年春我们全家人被骗到了北票炭矿，从此如同下了人间地狱。

我丈夫张玉荣被分到了台吉采炭所一坑，当了采炭夫。他在井下像牛马一般地每天挖十五六个小时的煤，只挣3角钱的

饭票。而这点饭票，还是不够全家人吃一顿饭的。由于生活上的不得温饱，又加上从关里到关外水土不服，不久全家7口人都得了瘟疫病。一天，我丈夫病得实在太厉害了，不能下炕就没去上班。这时，日本侵略者和大柜上催班的就来逼我丈夫下井。他们一脚踢开门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举起镐头、木棒朝我丈夫的脑袋上猛敲狠打，还边打边问：“你的脑袋硬不硬？硬就得下井下活！”我丈夫被他们打得实在受不了，就说：“人都快死了，还能给你们挖煤吗？”这一句话可捅了马蜂窝，日本侵略者和催班的狗腿子，立即恼羞成怒，硬说我丈夫是装病，又是一阵棍棒，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。我丈夫被打昏死过去，旧病没好，又添新病，病势更加重了。

因为我丈夫张玉荣不能下井干活，炭矿再也不发给我家饭票了，家里又一粒下锅米都没有了，实在没办法，我12岁的儿子宝喜，只好带着9岁和7岁的两个妹妹外出要饭。在日伪统治时期的炭矿，穷矿工家家都是吃上顿没下顿，到哪家能要到东西！我丈夫的病一天比一天重，73岁的公爹，又染上了瘟疫，眼看就不行了，想吃饭没米，想治病无钱。就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我只好狠狠心将9岁和7岁的两个女儿，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。

我们亲骨肉分离那天的情景，至今想起来我还落泪。那天，我拉着这两个还不大懂事的孩子，对她们说：“孩子，是妈妈对不起你们。你爹有病，又被日本人打成这样，不能挣钱养家了。你爷爷年纪大了，也有病。妈妈实在养活不了你们了，不要恨妈妈，只好送你们去逃条活命吧！”这两个孩子一听，一齐扑到我怀里，哭喊着：“妈妈，你不要把我们卖了呀！我们不饿，我们能帮你挖野菜，能和哥哥一起要饭养活你们呀！”这时，我丈夫张玉荣也强支撑着坐起来说：“孩子，你们过来，叫爸爸再好

好看你们一眼。不是爸爸、妈妈心狠，都是日本侵略者、把头逼得我们没路的呀！”就这样，全家人抱头痛哭一场，两个孩子终于被人领走了。

靠卖两个孩子的那点钱，日子还是过不下去。我丈夫的病没有好呢，我那73岁的老公爹又死去了。买不起棺材，只好用破席头把老爹卷上，埋到南山坡上了。

这接二连三的打击，把我这个家中唯一的“好人”也折磨得病倒了。别说吃不起药，就是一口稀汤也喝不上。丈夫见我病得如此沉重，为了救我的命，他就从炕上爬起来，求人把6岁的小女儿也卖了。他卖孩子时，我正发高烧昏迷不醒。等我醒来时，发现孩子不在身边，我就赶紧喊女儿的名字：“玉珠！玉珠呢？”我丈夫对我说：“我叫她出外玩去了。”

这时，我发现桌子上放着几包药和一碗稀粥。我丈夫劝我快点吃饭。我见此景已明白了一半，赶紧问孩子到底哪去了。丈夫觉得实在瞒不住我了，才流着泪对我说：“是我这个不中用的人，把孩子给卖了。”我听小女儿也被卖了，犹如五雷贯顶，立时就又昏了过去。等我一醒，就强挣扎着起来，要去把孩子要回来。我丈夫对我说：“别傻了，卖孩子的钱咱都花了，孩子要不回来啦！”我疯一样冲出门去，跑到买孩子那家，见到了我的玉珠。我上前把孩子抱到怀里，那可怜的孩子对我说：“妈妈，爸爸说别叫我哭，你也别哭。爸爸说等你和他的病好了就来接我回家。”我听了孩子说的这番“大人”话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

从老家来到炭矿不到两年，我全家7口人就剩下我两口子和一个大儿子宝喜了。我夫张玉荣的病情刚有好转，又被日本侵略者和催班的逼着下井挖煤去了。张玉荣由于病没好，加上吃不饱，身体虚弱，一点劲也没有。下井后，日本侵略者硬说

他干活磨洋工，朝着张玉荣的头就是一榔头，把张玉荣的脑袋立时打个窟窿。由于流血过多，再也不能下井干活了。

在日伪统治时期，炭矿明文规定：矿工因公伤病残不能在炭矿上班的，就不准再住工村的房子了。我丈夫被日本侵略者打得再也不能下井干活了，他们又来我家赶我们搬家。我们在北票一无亲，二无故，家往哪儿搬呀！万般无奈，只好叫13岁的儿子宝喜，顶替父名下井做工。小宝喜身单力薄，骨瘦如柴，装车没有炭车高，拿锹没有锹把高，日本人监工头和把头看他看不顺眼，常常把他打得遍体鳞伤。宝喜每天下班回来都是浑身血淋淋的。我和他爸爸看到这般情景，也只能是眼泪往肚子里咽，若有一分出路，也不能叫13岁的孩子去受这份洋罪呀！小宝喜下井每天挣3角钱饭票，根本不够养活我们3口人的。实在没有办法，我丈夫就让我到倪家大柜借点阎王债，用来给我丈夫治病。可是，钱花了不少，伤势反日渐恶化，大柜上还三天两头派人来逼债。一急，我的旧病又复发了。我丈夫张玉荣感到自己的病伤越来越重，我又被逼出病来了，实在不忍心连累我们母子了，于是他托人把我和儿子宝喜也卖了。他的想法：一是为还债；二是让我母子二人寻条活路。当我丈夫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心如刀绞，哭无泪，喊无声。我拉着张玉荣的手对他说：“你！你真不该这么做呀！你我是二十几年的患难夫妻了，你怎么这样不了解我，我们要死要活都应在一起！”我丈夫说：“孩子娘，是我不好，我正是念你我夫妻多年的恩情，才不忍心叫你和我饿死病死在一起呀！”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，就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我们小宝喜听到这个消息，紧紧地抱住我的腿摇晃着说：“妈妈咱们不能走呀！咱们走了谁来照顾爸爸呀！”这话真叫揪心呀！我丈夫用他那枯干无力的手，把宝喜拉到怀里，抚摸着他的头，半天才说：“孩子，是爸爸对不起你

们呀！爸爸是被日本侵略者和汉奸逼得实在无路可走了，才狠心卖了你们娘俩的。你要记住你爷爷是怎么死的，你妹妹们是怎么被卖的，你爸又是怎么被折磨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要记住咱穷人的仇和恨呀！”那一宿我们夫妻二人谁也没睡，说一会儿，哭一会儿，一直哭到天亮。第二天，北风呼啸，大雪飘飞。来领我的人，催我和孩子上路。我们3口人哭成一团，邻居们也陪着我们一起哭。我是真难以扔下在病中的结发之夫呀！记得那天正是1942年12月23日，我们这对苦命夫妻就是这样活活被拆散的。

后来我打听到：卖我和儿子宝喜的30元钱，全部都还债给了大柜。我们母子被卖后，只剩下我丈夫张玉荣一个人，又不能上班，被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撵出了原来的住房。后来他拖着沉重的病身子挨门要饭，夜晚到处留房檐。就在我被卖后的20天头上，张玉荣就被冻死在一间没人住的破房子里。不知过了多少天，才被日本侵略者发现，装上拉尸车，扔进了“万人坑”。

自从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，我们才过上了好日子。我儿宝喜参加了解放军，3个女儿也都有了工作，经常到我的新家来看我。如今我们都生活得很幸福。可是一想起日伪统治时期那段遭遇，我的心如同刀割，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那张卖我和孩子的“卖身契”。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北票炭矿，像有我这样遭遇的人何止我一个！日本侵略者逼得男人走投无路，只好典妻卖子还债的，何止是我丈夫一人呢！

（摘自《朝阳文史资料》第二辑）

血泪斑斑的“卖身契”

——四位妇女被日本侵略者迫害卖身的控诉

战丽珠

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炭矿之后，矿工被逼得走投无路，丈夫卖妻子之事却屡屡发生。贾宝珍、袁桂兰、刘光霞、栾凤琴4位矿工家属，都有一段被日寇逼迫卖身的历史。

贾宝珍：一提起往事，我就忘不了被卖的情景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
30多年前，我原来的丈夫刘德清在冠山一井当采煤工人。一次，老刘在井下干活，发现顶板有很多处都松动了，他意识到马上就可能发生危险。于是，老刘就和几个工人一道去处理事故隐患。可是，日本侵略者见他们没采煤就急了，说：“出煤的要紧，那点小事以后再说。”在日本侵略者的强迫下，工人们只好放下修理顶板，冒险去刨煤。刚刨几镐，老刘头上的一块磨盘大小的矸子石就掉下来，老刘急忙一闪身，大矸子石正好砸了右手腕，当时就被砸断了，鲜血直流。工友们都为老刘捏一把汗，以为他被砸住了呢。当老刘托着血淋淋的手回到家中时，把我们娘仨都吓呆了。我急忙将老刘的断手，用破布包扎好。这时，老刘因流血过多昏了过去，我和两个女儿七手八脚地将他扶到炕上躺下，喂了他几口水，他才慢慢地清醒过来。我忙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眼含热泪说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。听后，我们全家4口人抱头痛哭一场。老刘也哭了起来：“孩子娘，我这一伤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”我说：“你不要着急，有我们娘仨要饭给你吃，饿不死。”

老刘受伤后不能上班，炭矿就不再发给他饭票和工资了。到后来竟连一粒下锅米都没有了，我只好叫两个女儿到街上去讨饭，拣西瓜皮等物吃对付渡日。转眼过了几个月，老刘的伤仍不见好，吃不饱又得不到治疗，使老刘旧伤没好，又添新病。一天正睡着觉，他突然坐了起来：“不行，我得上班，我们不能这样活活饿死！”我拉不住，劝不回。就这样，老刘拖着带伤的身子又下井去了。

老刘的右手腕子根本就不能动，他忍着伤痛，非常吃力地用一只手干活。日本侵略者和把头、监工的看他干活不利索，经常是拳打脚踢加棍棒打他。老刘每天下班回到家中，脱衣如扒层皮，浑身被打得一块块伤痕，血迹斑斑，衣服被血紧紧地粘在身上了。我轻轻地用水将他的衣服浸湿，慢慢地往下给他揭衣服，每揭一下，他就痛得哆嗦一下，等揭完了，老刘早已痛得大汗淋漓了。只见他那干瘦的脸上像涂了一层蜡，黄里透青，两只大眼睛紧闭着，嘴角上咬出了血。

老刘就是这样天天挨打受气，为的是每天能挣4角钱饭票养活我们母女3人。可是，没过多久他就被折磨得起不来炕了，家中又断了粮。我只好向把头借债，把头的心肠黑又狠，借钱要大利，我家还不起债，最后连仅有的一口锅也被拔掉卖了，还是还不够阎王债，实在是走投无路维持不了生活了。一天，老刘说：“孩子娘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，你看行不？”我很纳闷，老刘是个爽快人，从不吞吞吐吐地，今天这是怎么了。我说：“你我夫妻十多年了，有什么话就说吧，还这么客气啥？”他见我这么说，眼泪就流了下来：“孩子娘，我对不起你呀！我是穷疯了，把你和二丫儿卖了，你们逃条活命去吧！卖的这点钱除了还债我还能活两天。不是我狠心，眼看我们都要饿死了，我才这么做呀！”听了，我的心刀刺一样难受。我从17岁就嫁给老刘，到

现在夫妻生活了十多年，生活艰难，我没有任何怨言。今天被卖，真是我想都想不到的事呀！我大哭了起来：“咱们夫妻一场，我又没嫌你穷，要死要活都在一起，你为什么把我卖了？你真是好狠的心呀！”“孩子娘，不是我心狠，是我实在养不起你们了，我不忍心看你和孩子们受这份罪呀！”老刘说着已是泣不成声了。哭了一会，他抬起头，像赔罪似的望着我。我的心也软了，是啊！这能怪他吗！这吃人的世道真是不叫我们穷人活呀！我二人边说边哭，两个丫头见我们哭，她们也跟着哭，一家人哭作一团。

第二天早上，保人和伪村长吴老催领着两个警察到我家，他们手拿马棒，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，硬逼着我跟他们走。保人和吴老催将事先写好的“卖身契”拿出来：“刘德清，快按手模脚模！”老刘脸色蜡黄，两眼发呆。“快点！”保人又喊一声。老刘浑身哆嗦了一下，手脚发颤，还是不敢靠前。伪村长吴老催一把将他拽了过去：“怎么还不快按！”说完硬逼着老刘在“卖身契”上按了手模、脚模。按完就见老刘踉踉跄跄的往炕前走，我刚想上前扶他一把，警察用棒子将我拦住，见老刘一头扎在炕上了。看老刘这样，我就拼命往炕上扑。可是，两个警察一人拽我一只胳膊，将我架了出去。我挣扎着，大哭大喊都无济于事。两个孩子牵着我的衣角不放，边哭边喊：“娘！娘！”我嘶哑着喊：“孩子！听话……”没等说完就被这群狼狗连拖带拉地拽走了。我大女儿刚刚9岁，她明白了这一切后，就发疯似地出户外：“娘呀！小妹！你们不能走呀！”警察用棒子将她打了回去。

听说我母女二人被卖了120元钱，伪村长吴老催还从中克扣不少，除去还把头的债，也就所剩无几了。我被卖后，老刘和大女儿一起生活，靠的是每天孩子要点饭糊口。不久，老刘

就精神失常了，疯疯癫癫地折腾了20多天，就悲愤地离开了人世。

我被卖后，由于日夜思念老刘和大女儿，因整天哭啼，不长时间右眼就哭坏了，长了白内障，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。

袁桂兰：我18岁与张景富结婚，在朝阳区梁家菜园老家生活了6年，有了个男孩，取名叫常生。1941年（伪满康德8年）阴历八月，我丈夫被要劳工来到北票炭矿台吉一坑挖煤，这时他才32岁，我24岁。同年阴历十月，我带着儿子常生来北票炭矿找丈夫，住在台吉一工村。

孩子爹每天早起晚归地下井挖煤，只得8角钱饭票。另外工资也不多，每月才10元左右。

在日伪统治时期，日本侵略者、汉奸、把头为了搜刮矿工挣的仅有的钱，他们合伙在工村、单身寮等地开设很多的赌场、烟馆，诱骗矿工去赌博，去抽大烟和扎吗啡。你不去，他们就先施小恩小惠拖你下水，等你上套了，他们就开始算计你手中那几个可怜的钱了。每到开支之日，日本侵略者和把头就拉孩子他爹去抽大烟、扎吗啡。说是这样可以提神，干活就有劲了。一来二去的，孩子他爹就抽上瘾了，每天下班他都得去抽、去扎，时间长了，把两支胳膊都扎烂了，流脓流水的，腥臭气味难闻。就是这样，犯了瘾，他还是要去抽，去扎。到后来，他的脚都肿得老粗，终于病倒了，不能上班了。这样，就得不到饭票了，一家3口人经常揭不开锅。孩子他爹就将家中的破被褥、破旧衣服、洗脸盆等常用家当全部卖了，还是不能维持生活。

1941年腊月末的一天早上，他爹把只有4岁的儿子常生抱出去了。我原以为他抱孩子玩去，也没在意，等到中午他才回到家来。我见他没抱孩子便忙问：“常生呢？”“在人家玩呢。”当

时，我信以为真。可是等到晚上，孩子还是没回来，我急得哭了：“你把孩子放谁家了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你咋不去找呀？”我问了几遍，他就是不吱声了。我知道他可能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，就一个劲地追问。他还是一声不吱。当时，我也是被折磨得浑身是病，正在炕上躺着，不能起来去找孩子。只好等到第二天早上，我又催他去把孩子找回来，他才哭着对我说：“我把常生送人了。”我一听就大哭起来，真想和他拼了。我问他把孩子送给谁了，他还是吞吞吐吐不说把孩子卖给谁了。

孩子被卖后，虽然只剩我们两口人了，因孩子他爹不能上班，还是没吃没喝的。时值冬日，屋里冷得像个冰窖，四面透风，也没柴烧炕。我的左脚趾全冻烂了，不久又全冻掉了。无奈只好依靠穷哥们周济过日子，可这总不是长法，我们谁都于心不忍，因为他们比我们也强不了多少。为此，孩子他爹就动了卖我的心。他天天和我嘀咕：“我也好不了，你逃条活命去吧！”我听后放声大哭：“你已把孩子卖了，也没富，又想卖我，我不走！要活活在一起，要死死在一处！”不管孩子他爹如何跟我商量，我就是不同意。可是，到1942年阴历正月二十日，我到底还是被丈夫卖掉了，卖给了土城子大荒杨景树家。中人是张殿荣、刘海山，由张殿荣写的“卖身契”。我被卖了满洲币320元，孩子他爹只得40元，其余的全叫中人和介绍人拿去了。

我被卖走那天，孩子他爹从台吉一直将我送到兰旗大庙上，一路上我们哭得嗓子都哑了，真是痛不欲生。听说，我被卖走半个月以后，孩子他爹就被折磨死了。我听到这一消息，想儿子，想丈夫整天眼泪洗面，由于过度的悲伤，我哭瞎了一只眼睛。我们这妻离子散纯是日本侵略者残害的！

刘光耀：我1942年冬随丈夫李国春从赤峰到北票炭矿。我丈夫在炭矿当劳工，受尽了日本侵略者、汉奸、把头的残害之

后，他开始抽大烟、扎吗啡了。时间一长有了瘾。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很难，这一来就更是经常揭不开锅了。有时，我丈夫下井干活挣的饭票被他换了大烟抽，我们只好饿着。到后来生活走投无路了，于1943年正月二十四日这天，我被丈夫卖给了朝阳的杨世生为妻。共卖了100元钱和两匹土布，介绍人是刘振奎。我还清楚地记得“卖身契”是用红布做的，按有我原丈夫李国春的手模脚模。

栾凤琴：我原籍是北票西官营子人。在日伪统治时期，我父亲在北票炭矿当劳工，家有父母、哥哥、弟弟共5口人。由于日本侵略者为亡我中华民族，他们用鸦片来毒害我广大矿工。我父亲也抽大烟成瘾，后来越抽越穷，穷得这个5口之家不能维持了。没吃没烧，全家大小都是衣不遮体，食不饱腹。

1942年那年，我刚7岁。腊月的一天，父亲抱起我，说是给我买吃的去，我高高兴兴让他抱着走了。他把我抱到白文林家交给他就自己回家去了。我见父亲扔下我不管，我就哭喊着要跟他回家去找妈妈。可是，他难过得连头也不回。我又忙喊：“爸爸，你带我回家找妈去呀！”只见他犹豫了一会，最后一跺脚就走了。我被人拽着、哭喊着离开了我所有的亲人。过几天，我就被卖给了朝阳的杨世有，共卖了伪币100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白文林是专门买卖人口的人贩子。

一张张沾染上血腥气味的卖身契，沾满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、把头们杀害中国矿工的鲜血，是他们逼得矿工们走投无路，才狠心卖掉自己亲人的。既使卖掉亲人，也没改变了他们的悲惨命运，最后仍然是被扔进了“万人坑”。这决不是一家一户的仇恨，这是全民族的仇恨！

（摘自《朝阳文史资料》第二辑）

童工的血泪仇

——北票炭矿十名童工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

战丽珠

老干部张荣启：我9岁就在机厂当童工。当时机厂工人总数是250人，其中童工就有112人，占成年工人的48%。童工年龄大多数是12岁或13岁。我们童工每天干的是大人干的活，但每天挣三四角钱的微薄工资，到月末开支时还要扣除4角钱供给费，说是用这笔费用给童工看病，而真的有了病，却得不到治疗，顶多是手脚碰破伤时给上点红药水罢了。还要扣除储蓄金1元。此外，剩下的钱还要给日本侵略者、把头送礼。所剩的工资也就无几了。童工的工作时间是不固定的，最早是清晨5点30分上班，晚上11点才能下班。徒工就是日本人和汉奸的杂役，什么活都得给干，扫地、生炉子、热饭、取饭、打煤坯子等，干不好就要挨打挨骂。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对中国工人的奴化，加紧对我们童工的压迫，每天早、午上班都要给他们问安，不问安就要罚站，或遭到拳打脚踢。每天吃中午饭时，全体童工站在饭桌前，先念日语。意思是：感谢日本天皇的恩赐。念完经再把饭盒打开，接受日本人的检查，日本人认为没有问题了，就一拍掌，方准吃饭。日本侵略者还用迷信思想来奴化童工，让各个车间都必须供老君爷画像，并一个月在老君庙前开一次会。工人有病，日本人就逼工人到老君庙去烧香求神。日本侵略者还在各车间里设有岗楼，专门监视工人干活。

总机厂干部王秀山：1944年我12岁，按炭矿当时规定不发给我饭票了。为了能活命，我只好下井当了童工。由于家境贫

寒，我长的个头又矮，还没有铁锹把高，下井干活时拿锹走路困难，只好抱着锹走。因为锹总是绊脚，所以经常摔倒挨摔。我在井下干的是看风门、挖水沟的活计。因力气小，风门经常拉不开，常常是刚拉开一个缝儿，车就撞过来了，有时炭车被撞落道了，为此我无数次挨日本侵略者的毒打。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四片挖水沟，听见车来了，就急忙跑过去拉风门。我使出全身的力气，拼命地拉，怎么也没把风门拉开。眼看炭车飞快地冲到跟前，我急忙把风门松开，结果炭车把风门撞坏了。日本人平川看见了，两眼一瞪，拿起他那一头尖尖的小镢头，劈头盖脸地朝我打来，痛得我满地打滚。平川见我就是不求饶，就越打越气愤，直到他打累了才住手。我被打得浑身是伤，青一块紫一块的。

老工人龙殿元：我11岁在选煤厂拣矸子。当时我的个子很矮，够不着手选台，只好在脚下垫两块道木，然后再整个身子趴在手选台上拣矸子。有时煤和矸子分不清，拣错了就挨日本人和把头的打。有时遇上大块矸子搬不动，就拼命地挪，一不小心，手脚就被砸上。我的手指甲，经常是这个砸掉了刚好，那个指甲又被砸掉了。后来我到寇山炭车厂学烧电焊。学徒工的工资每月仅8元，但是干的却是杂工活，每天要给日本人和师傅打洗脸、洗脚水、劈木柴、送饭，有孩子的还要给他们看孩子，过年过节时还要给他们送礼，就这样干了好几年以后，才摸到电焊把。

老工人张国新：我13岁时，因家里穷就到机厂当学徒工。说是学徒，实际上是给日本人、汉奸当杂工。当童工的活非常不好干，稍不留神，轻则挨打，重则就要被赶走。所以，我们每天都是格外小心地伺候这些吃人的野兽。尽管这样，也难免要挨打。有一回日本人钟川叫我去打开水，水打回来后，钟川硬

说这水不开，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。还有一回上夜班，我刚把炉子点着了，鬼子钟野说炉子不旺，拿起皮鞭没头没脑地抽起我来，还一边抽一边骂：“你的没用，死了死了的！”我的家里很穷，每月的工资又被扣得所剩无几，没钱给日本人和汉奸们送礼，使汉奸牛德禄（日本人的翻译）十分恼火，经常找茬打我。有一次，他硬说手选斗子的皮带被压住是我故意搞破坏，一脚把我踢倒在地，然后又叫我跪在水泥地板上，他拿木棒子狠狠地打我的腰。打了一顿还觉得不解劲，又左右开弓地打我的嘴巴，一边打他还一边骂，说要解雇我。那时，我们童工挨打如家常便饭，连我们的命运也操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，能活过来的就算是幸运的了。

矿工家属平彩方：我父亲苗兴旺，伪满康德10年在井下死了。家中剩下我娘、哥哥、姐姐和我。父亲死后，家中无人在炭矿上班，倪家大柜就来人逼我们搬家，不让我们住工村房子了。没有办法，娘只好将15岁的哥哥苗井山，送到倪家大柜顶替父名当了劳工。1944年冬的一天，哥哥在坑下拉车，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，就从坑下上来了。一到井口，日本人和催班的就问：“车都拉上来了吗？”哥哥说：“还有两车没拉上来。”这两家伙一听就火了，不容分说就把我哥哥打了一顿。之后，又逼着我哥哥下井去拉车。我哥哥在坑下已经干了十二三个小时的活了，已累得直不起腰了。又被鬼子打了一顿，腿都抬不起来了。这时偏偏又赶上矿灯灭了，只好摸黑下坑去拉车。在通过坑门时，炭车突然落道了，不幸把我哥哥砸在底下。当时没砸死，被工友们抬到医院，因没有床位了，就把哥哥放在走廊里了。那时的医院不是为咱们矿工开的，没钱就别想治病。我哥哥被放在走廊后，没有人过问，更谈不上给打针吃药，等娘带我赶到医院一看，我哥哥已含恨死去了。

选煤厂高贵合：我15岁时在冠山选炭系当了童工。当时冠山选炭系工人总数180人，其中童工为80人，占成年工人的44%。我是拣矸子的，每天挣四角七分钱，没有饭票。

那时，我们童工是最苦的，日本人和汉奸把头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待，经常随意打骂我们，有时日本人看我们不顺眼，就叫我们童工互相打嘴巴，直到他们认为满意，才叫停下来。我们的身上经常是旧伤没好，又添新伤，整天是血泪相伴过日子。记得在1944年，有一个姓郑的童工，被矸子埋住了，日本人不叫我们去救人，眼看着他被矸子石活活地压死了。

选煤厂邵怀中：我13岁当童工，在选炭系拣矸子石，一天只挣三四角钱，每天却要干12小时以上的活。冬天我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，繁重的劳动使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经常昏倒在地，如被日本人和汉奸看见，就被棍棒相加地狠打一顿。有时上夜班，摔得我们东倒西歪的，日本人和汉奸看见又是拳打脚踢。当时，我们童工就是在日本人和汉奸的棍棒下，为他们当牛做马，生命和安全根本就没有保证。日本侵略者只要煤，不要人，根本就不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，选煤厂的运煤皮带，不设保护罩，那时被皮带绞住断胳膊断腿的童工很多，一旦出事就被赶走了，多数都因伤残得不到治疗，生活无着落而小小的年纪就送了命。

刘万山：伪满康德9年秋后的一天，三宝选煤厂一个姓白的童工，被皮带绞死了。当时的情景十分悲惨：肠子、皮肉被绞得遍地都是，全身上下都没剩下一块完整的肉了。那个童工被绞死时才只有13岁。

张景文：1943年，日本人在工村招童工。我当时12岁，就和我的小伙伴张天津、孙福廷一起到选煤厂当了童工。童工的工作量非常大，又很危险。我们干的是十分沉重的牛马活，但

每月只有7—8元的工资。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面、豆饼面和橡子面。即使是这样的猪狗食，我们也吃不饱，经常是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。冬天，连冻带饿更难熬。记得1943年冬的一天，我们几个童工上夜班，被冻得实在受不了啦，就趁鬼子把头睡觉之机，到火炉旁去烤火。又冷又累腹中又无食，烤着烤着在炉旁睡着了。时间长了，张天津身上那件破烂不堪的衣服被炉火烤着了。我们当时都懵了，等明白过来再去扑打张天津身上的火时，已经来不及了，火越烧越旺，怎么也扑不灭，一会张天津就被烧得半死。等我们七手八脚把火扑灭时，他已是奄奄一息了。大家把他抬到医院，日本人不给治，不到一天张天津就死了。

我的另一个伙伴孙福廷，在一天晚上作业时，皮带卡住不动了。他见日本监工的来了，一阵心慌，赶紧用脚去蹬皮带。这一蹬，皮带转动了，他却被皮带绞到里面去了。他拼命大喊，几个工人上前把他硬拽下来，幸免没被绞死，但双脚却被绞得血肉模糊。到医院医生坚持要给截脚，他父母借了许多钱，给医生送了礼，才把双腿保住了，但却成了终身残废。最后还是被日本侵略者赶出了炭矿。

关立成：我13岁就到炭矿当童工。当时，我们童工只有干活的权利，没有其它任何人生的权利。日本人、汉奸经常拿我们小童工开心玩。日本人为了寻乐开心，就把我们童工叫到凉水管子前，用凉水浇我们，直浇得我们个个嘴唇发青，浑身打颤，像落汤鸡一样，逗得他们哈哈大笑才算完。日本人不高兴时，就看我们童工不顺眼，举手就打，拍脚就踢，还想出了很多花样来剥削压榨我们。如规定在劳动时间里，不准随便说话、交谈，说话就说你是八路军、共产党，不打死也要扒一层皮。还规定上厕所要向把头报告，同意你去了，把头就给你一个“出

恭牌”。这个牌是木头板做的，每个组只有一个，先去的回来交了牌，下一个才能去，谁回来晚点，也是要挨打的。

[注]：据有关资料记载，北票炭矿仅在日伪统治时期的1940年到1943年，日本侵略者就用各种手段招骗童工4213人，占当时劳工总数的13%左右。有的部门童工要占成年劳工的一半左右。童工最大的15岁，最小的只有9岁，多数是十二三岁。为生活所迫，这批十几岁的孩童也不得已陷入了炭矿这座人间地狱。

童工们在炭矿的坑下、选煤厂、总机厂负担着和成年劳工一样沉重的苦役，而他们的劳动所得却只是成年劳工的一半或三分之一。他们是炭矿上受剥削、受压迫最深最重的阶层。上面10名幸存者的血泪控诉，也只是当时童工悲惨生活的一部分缩影。

（摘自《朝阳文史资料》第二辑）

日本侵略军对北票农村妇女的凌辱

王瑞林 张树相

1932年冬，日军侵占朝阳寺附近各村，他们以散发洋货和奇缺物资为诱饵，收买人心。待人们麻痹后，到处挟持美貌少女到日本兵营进行强奸。人们虽然强烈抗议，但日军不但制止，反而支持士兵的罪恶行径，士兵越发骄横放纵，不分昼夜闯入民宅，对妇女任意蹂躏。

1933年2月日军进入北票城内以后，指使汉奸专设妓院，尽量满足日军士兵兽欲的要求。日军士兵也经常酒气熏天，至

戴皇军帽，横冲直撞，到处搜寻女性以供淫乐。

特别是1934年以后，日军对大黑山地区兰天林抗日力量进行“扫荡”，将这个地区的妇女糟蹋得更为悲惨。每次“扫荡”，对那些来不及躲避的妇女，进行惨无人道的奸淫和屠戮。如1935年秋一天，100多名日军突然闯入某村，用机枪扫射村民，将没有逃脱的男女老幼圈到大院里。而后日军拽着姑娘们发辫，从人群中把她们拖出来抱在膝上，一边抚摸调戏，一边痛饮烈酒。一阵狂笑、叫嚣之后，几名姑娘被这一伙兽兵推到屋内轮奸。日军兽性发作，丧尽人性廉耻，轮奸妇女常常还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不避村民广众，甚至强迫其婆母在身边观看。

在大黑山某村，日军进村发现一个怀孕的年轻妇女。这个妇女结婚一年，怀孕6个月，在日军们威逼下被赶进一个院子，几个日军酗酒嘲弄这个妇女，最后又把她拽到屋里，她极力反抗挣扎，日寇又把她身穿的衣服全部剥光，让她裸露着身体，把她仰面绑在桌凳上，这群兽兵任意耍弄、照相，而后手操刺刀剖腹，取出孕妇的婴儿……

在北塔乡附近某村，日军对农村妇女百般调弄，他们见到一个缠足妇女走路摇摆，便把这位妇女赶到屋内，命她脱掉鞋子，拽掉裹脚布，日军一齐拥挤上来，摆弄妇女脚趾，以娱其乐；而屋外不满8岁的姑娘，在丢魂落魄地寻找妈妈中，日军竟抽出战刀向她脖颈锯去，姑娘的哭嚎惨叫声，伴随着兽兵们的阵阵狞笑。

日本侵略者在北票地区统治12年，许多无辜百姓丧生，无数财产被日军搜为己有，许多村庄及房屋化为焦土，广大妇女姐妹受到莫大的人身凌辱和兽行的蹂躏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！

（北票市政协供稿）